

## 寻求“道德的标准”<sup>1</sup> ——明治日本的道德教育——

林子博 (LIN Zibo)\*

### 导言

笔者的研究方向是近代日本道德教育方面的政策与思潮。力图将现代社会中关于“市民伦理”、“国民道德”以及价值观构建等方面的思想课题作为近代国民国家形成的普遍问题，透过考察日本近代教育中的国民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进行理解和把握。

目前笔者的研究课题是通过探讨日本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1847-1889）所主导的德育教科书编纂所引发的争论，阐明教育敕语发布前夜的有关道德教育的各种讨论的历史意义。

本报告旨在对这一问题意识与课题设定进行介绍。以此呈现明治时期日本在道德教育方面所面临的问题群的基本轮廓。

### 1. 问题意识——为什么要谈道德教育？

笔者的研究动机来源于自身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与其相关的各种言论的观察及感受。近年来，市场经济高速增长所衍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显现。对于不断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及官僚腐败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企业道德（市场伦理）的欠缺和拜金主义的横行。类似中国“国民道德大滑坡”、“民族信仰”抑或核心价值观的欠缺等言论甚嚣尘上<sup>2</sup>。面对市场经济中利己主义的泛滥所导致的不公与社会秩序的混乱，树立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被作为对策提上了台面。舆论呼唤能促进国家社会秩序的和谐安宁与人民团结的道德教育。

而另一方面，对国家（中央政府）所推进的道德教育唱反调的声音同样存在。2010年，旨在将“国民教育及德育课程”导入香港中小学的提案由于遭香港市民质疑为意识形态洗脑的愚民教育，而被迫撤回。2012年4月的再次提交除了再次遭到同样的批判之外，更引发了大规模的市民游行示威（“反国教运动”）。批判者的逻辑提醒人们需警惕作为国家对人民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道德教育。

“道德标准”、“民族信仰”以及“反国教”等言说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笔者希望能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国民国家框架下的道德教育本身的意义及其多元的可能性。

### 2. 研究的视角——思考明治日本／从明治日本思考

为了思考上述问题，笔者选择聚焦明治期，尤其是教育敕语发布前夜的日本。教育敕语是于1890年10月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通过文部大臣颁布的，昭示日本教育方针的文件。声称

---

<sup>1</sup> 本报告在整理时参考了如下两篇拙稿。林子博「雑誌『国民之教育』にみる道德教育論争：森文政期における『倫理書』編纂過程の再検討」（『日本の教育史学』55号、2012年）、「森文政期における「倫理」と「道德」のあいだ」（『教育学研究』80(4)号、2013年）。可一并参考。  
\* 京都大学研究生。

<sup>2</sup> 2012年4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于国务院参事进行会谈时专门谈到了近期的“毒饺子”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认为是由于信用的丧失和道德的堕落导致了如此的严重后果。事后，《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刊载了《如何才能催生道德血液》、《用法治堤坝阻止道德滑落》、《总理讲话引发思考 如何止住道德滑坡》等评论文章。另外，联系时下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探讨核心价值观缺失的学术著作亦不少。如潘维「論現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観」、吴志攀他編『東亜の価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華戰略文化論壇叢書編委会編『社会主義核心价值観與中華戰略文化』（時事出版社、2010年）等。

皇室祖先确立了“臣民”的道德规范，而“臣民”团结一致实践忠孝道德乃“国体的精华”与“教育的渊源”的教育敕语，长期作为帝国日本道德教育的根本规范，直到1948年国会决议将其废止。教育敕语的颁布并非突如其来，说起其制定与发布的舆论背景，就不得不提到1887年前后的“德育论争”。论争的导火索是时任东京学士会院院长的加藤弘之在大日本教育会上的演说。加藤主张将神道教、儒教、佛教与基督教同时导入全国的公立中小学校，由各教的教徒依据本教的教义来教授德育课程并鼓励其自由竞争，以此来推进德育发展。他的发言迅速在教育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将加藤所引发的的大讨论命名为“德育论争”并予以介绍的教育史学者久木幸男认为，这一时期各方论者最关心的问题无外乎寻求德育的基准。而各种讨论所预设的前提其实是“我日本国乃道德法根基不牢之国”<sup>3</sup>。也就是说，道德教育缺乏统一的基准这一认识无论在政府抑或在教育界都颇有共鸣。这一言论状况正是“德育论争”的特征。在加藤演说之前，另一位启蒙思想家西村茂树则以更明确且富有危机意识的语调提出了关于道德标准的命题。于1886年12月帝国大学的讲义室内举行的论“日本道德”的演讲中，西村犀利地指出，“王政维新伊始，万事吐故纳新，由此，以往士人所尊奉的作为道德标准的儒教亦一并遭弃……日本中等以上的人士失去了道德的根据，与封建时代相比，人心涣散，民风亦呈颓废之势。”<sup>4</sup>西村所说的“道德标准”可以理解为维持社会秩序及统合民心的特定的价值体系。西村认为，世界各国都不乏特定的教义来维系民众的道德，仅有日本，由于明治维新所导致的儒教权威地位的瓦解，旧道德已废，新道德未立，正是这种“国民道德”“国教”的缺失导致了世风日下与人心的腐败，更使人心无法团结以抵御西洋列强的威胁，维护日本独立。西村充满危机意识的讲稿除了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版外，还通过《教育时论》等主流教育杂志的转载在教育界传播开来。此后，围绕“道德的标准”的内容，乃至“标准”本身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的讨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sup>5</sup>。而给这场“标准”大讨论划上一个权宜性的休止符的则是教育敕语这一官方“标准”的颁布<sup>6</sup>。

在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国民国家体制下的道德教育的本质通过论争的形式曲折而鲜明的表现出来。从这一点来说，这一时期的明治日本既成为了追问构建国家价值体系以及实施道德教育的意义和可能的素材，其中所包含的经验亦可为审视现代社会的德育问题提供一个相对化的视角。通过思考明治日本，将其化为一种内在的方法，并以此考察现代社会有关道德教育的各种面相。笔者的研究视角即在于此。

### 3. 研究对象与方法——着眼森有礼文政期的伦理教科书的编纂选定项目

#### 1) 先行研究评述

笔者以为，以这一时期的教育史为考察对象的先行研究多将焦点集中在探讨天皇制教育体制确立的前提条件，忽略了对以“标准”缺失为论调的论争状况的内在考察。具体而言，针对直接参与教育敕语制定的元田永孚与井上毅等个别人物的德育思想形成及其与教育敕语

<sup>3</sup> 久木幸男等编《日本教育论争史录》（第一法规出版，1980年）第一卷近代篇（上），66页。

<sup>4</sup> 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1887年），日本弘道会编《增補改訂西村茂樹全集》一卷，104页。

<sup>5</sup> 比如西村正三郎《德育新论》（普及舍，1888年）。

<sup>6</sup> 然而，教育敕语的发布并没有也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平息关于德育的各种讨论。讨论逐渐转向了如何、通过何种教义（儒学、哲学抑或宗教）去阐释和实践教育敕语这一“标准”。

的关系的研究不胜枚举，而从不同于所谓的教育敕语成立史的视点对当时的讨论本身的历史意义进行考察的研究并不充分。

最早指出这一问题的是日本教育学者佐藤秀夫。佐藤把明治德育史研究的先驱海后宗臣所从事的一系列的教育敕语研究<sup>7</sup>的范式批判为“教育敕语必然论”，对其以元田永孚一派的主张为主线勾勒教育敕语发布前的德育史的手法亦持否定态度<sup>8</sup>。按照田中智子的说法，佐藤将超越海后范式的希望寄托在对森有礼文政期（1885年12月至1889年2月）的探讨上<sup>9</sup>。他认为森文政中包含了通向近代教育的多样的可能，而森有礼的遇刺（1889年2月）象征了“教育的明治维新”的戏剧化的落幕。事实上，通常被认为是促成教育敕语制定契机的1890年2月的地方行政长官会议上，森文政时期的教育（尤其是推行伦理科教育的师范教育）被理解为只重视知识而忽视道德的教育，还被当做德育不振的元凶加以痛批。

在这个意义上，森文政的德育理念和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既可以说是处在“德育论争”的漩涡中心，又勾画出了一条并不通向教育敕语的，通向“近代教育”的另一条道路。然而，森文政所构想的德育究竟是怎样的？佐藤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便与世长辞了。而之后的森文政研究长期以来习惯于把那一时期文部省编纂的德育教科书《伦理书》当做森有礼本人德育思想的结晶，透过从青年期森有礼的思想形成（尤其是森有礼与主张社会进化论的学者斯宾塞的交流）的层面对其文本加以解读，并希冀以此把握森文政的德育政策的本质<sup>10</sup>。可正如报告者后续要谈到的，《伦理书》虽然是探讨森文政时期德育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素材，但它并非森有礼个人所作，而是集体编纂的作品。因此既往研究的分析手法并不可取。况且笔者认为，《伦理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文本的内容，更有必要将其编纂过程放在“德育论争”这一历史脉络下进行讨论。下面，笔者将对本研究的课题设定和论点作介绍。

## 2) 课题设定与论点概要——围绕《伦理书》编纂的论争空间

基于前述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史的整理，本研究通过以森文政的德育教科书的编纂及选定为中心的考察，试图揭示教育敕语这一“标准”设定以前关于道德教育的讨论所包含的历史意义和可能性。具体而言，笔者聚焦森文政时期中等学校新设立的伦理科（由之前的修身科改组而来）的教科书《伦理书》（文部省编）与《布氏道德学》（Fricke 著，松田正久译）。与教育敕语发布后仍持续使用了数年的德语翻译教材《布氏道德学》（由森有礼亲自选定）相比，原计划在全国中等学校（师范学校与中学）全面使用的《伦理书》在森有礼遇刺后便受到冷落。然而，在寻求“标准”的“德育论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在森有礼的精心策划下面世的《伦理书》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由多位背景迥异的编纂委员参与讨论起草，并邀请当时日本最具权威的学者与教育家进行点评的这本教科书及其编纂过程，可谓是当时的日本知识界对德育问题所进行的集体探讨的“现场记录”。

根据教育史学者稻田正次的描述，森有礼当初邀请了五名编纂委员参与讨论起草。他们分别是精通西方教育学的文部书记官能势荣、曾留学生津大学学习西洋哲学的僧侣菅了法、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Walter Dening、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学习院教头嘉纳治五郎，以及

<sup>7</sup> 海後宗臣・吉田熊次『教育勅語渙発以前に於ける修身教授の変遷』『教育勅語渙発以後における小学校修身教授の変遷』（1935年）、海後『教育勅語成立史の研究』（1965年）等。

<sup>8</sup> 佐藤秀夫「教育史研究の検証」（『教育学年報6 教育史像の再構築』世織書房、1997年）。

<sup>9</sup> 田中智子「森有礼文政期研究の現在と射程」、『教育史フォーラム』第9号。

<sup>10</sup> 長谷川精一『森有礼における国民的主体の創出』（思文閣出版、2012年）。

提倡通过融合儒学与西洋哲学树立全新“日本道德”的西村茂树<sup>11</sup>。然而，在编纂会议过程中由于这5名未能就编纂方针达成统一意见，最终森有礼决定让能势荣与菅了法为中心来负责起草。在听取了森有礼的校阅意见后，由两人编纂的《伦理书》于1888年3月成型了。森有礼将这份初版寄给了福泽渝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井上毅、元田永孚、折田彦市等人以听取批评意见。同年10月，在做了部分修改之后，本书的完成稿（再版）最终问世。其目录见下图（初版与再版的目录完全一致）。

目次
第一章 概論
第二章 目的
第三章 行為ノ起原 体慾ノ欲望ノ情緒ノ聯想ノ習慣
第四章 意志 意志ノ解ノ無意ノ作用ノ意志ノ他ノ能力ニ対スル關係ノ意志ノ正用ノ意志ノ自由
第五章 行為ノ標準 標準ノ解ノ自他ノ併立ノ社会的見解ノ道理の見解ノ感情の見解

以心理学与伦理学的初步理论为基础编写而成的《伦理书》受到了各路学者怎样的反馈呢？从《伦理书》编纂中途开始就对当时文部省的德育方针公开表示不满的学者不乏其人，加藤弘之首当其冲。如前文提到的，在1887年11月于大日本教育会进行的题为“关于德育的一则提案”的演讲中，加藤主张将各路宗教导入学校的德育课程，后来因此引发了“德育论争”。加藤指出“学者与教育家摘抄道德哲学编辑而成的大杂烩式的教科书是行不通的，靠堆砌道理的教科书搞不好德育”，暗讽森有礼等人的《伦理书》编纂属无稽之谈<sup>12</sup>。那么，为什么加藤认为德育非靠宗教不可呢？他这样说道“德育本来就不是靠知识或讲大道理，而是靠感情。因此非要请出拥有超能力的本尊来唤起人的感情才能让道德落到实处”。

撇开是否请出宗教上的“本尊”这一具体操作层面的争议，靠知识与道理行不通，唯有诉诸感情才是德育的王道这一部分的逻辑即便在反对宗教德育主张的论者那里也不乏共鸣。西村茂树就是其中一人。对加藤的主张提出批评，并从合理主义的角度批判宗教德育的西村同时又表示“宗教中最可贵的是尊信”，“在道德的实践方面，尊信至关重要”<sup>13</sup>。这是因为，只有唤起类似宗教信仰的“尊信”的感情，才能让国民实践道德，遵守社会秩序，确立社会的良好风俗。始终强调德育中“尊信”必要性的西村在被森有礼排除在《伦理书》起草成员之外后，马上策划了旨在借助天皇权威来选定颁布修身教科书的请愿运动，希望借助皇室的权威给德育教科书注入“尊信”的要素（后此活动因遭到森有礼的强烈反对而作罢）。

另一位受森有礼之邀对《伦理书》做点评的福泽渝吉亦从“尊信”的角度批判该书。在给森有礼的信中，福泽指出“德教之书，因出自古代圣贤之手，虽主义各不相同，后世之人

<sup>11</sup> 稻田正次『教育勅語成立過程の研究』（講談社、1971年）第六章・五「森の倫理書編集と元田らの批判」。

<sup>12</sup> 加藤弘之『德育方法案』（哲学書院、1887年）、12頁。

<sup>13</sup> 西村茂樹『日本道德論』訂正二版（井上円成、1888年）、60頁。

无不尊信，此乃圣贤本人德高望重是也”，“如今编纂伦理教科书的文部省中试问有何人堪称德高望重，以博得天下众人尊信也？”<sup>14</sup>

尽管遭到上述批评，《伦理书》改版时不但没有被注入任何“尊信”的要素，反而更加彻底贯彻了理论化的性格，并通过将内容定位为“伦理”来强化自身立场。在再版时添加的“凡例”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述。“伦理属于原理范畴，道德则属于法则。本书旨在阐明伦理的标准，而非传授道德的法则”<sup>15</sup>。由森有礼亲自起草的“凡例”何尝不可视为编纂小组对批评者的回应呢。

#### 4. 结语——“伦理”的挫折与“修身”的复权

如前所述，森文政的德育政策在1890年的地方长官会议上遭到了全盘否定，希望依靠天皇的权威下达统一的“标准”“主义”的呼声空前高涨。教育敕语正是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登场的。敕语发布两年后，森有礼当年制定的“寻常师范学校的学科及其程度”被修订，作为森文政期德育改革的看板的“伦理科”被重新改为“修身科”。对于这一修改，官方解释道是为了消除人们对师范学校德育课程重点教授伦理学的误解，因此把易与伦理学讲授混为一谈的“伦理”改回之前的“修身”，以强调德育科目更重视躬行实践而非空谈理论<sup>16</sup>。

从明治维新所带来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动摇，到1880年代前半期企图恢复儒教权威地位的德育政策的实质性破产，再到取而代之的森文政的登场，德育的路线方针问题包含着如何打造国民这一时代课题被反复讨论。森文政的德育改革大刀破斧地拿下了修身科，让本就对德育方针的走向充满疑虑的教育界更感困惑。而由于当时“伦理”一词才刚刚随着西洋伦理学被介绍到日本而被发明出来，人们对“伦理”教育究竟为何物尚众说纷纭<sup>17</sup>。因此，在《伦理书》出版甚至着手编纂之前，社会上就已经隐约开始弥漫对德育“标准”的诉求。西村茂树的《日本道德论》也好，后来的德育论争也罢，都已寻求“标准”作为主题。在这种情况下问世的象征森文政期德育理念的《伦理书》，作为文部省的官方出品，是否提出了一个令各方满意的“标准”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固然，《伦理书》提出应把“自他并立”作为“行为的标准”。主要起草人的能势荣也曾在多个场合将“自他并立”权宜地称为“道德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文部省有意识地介入并回应了坊间对于“标准”的论争也未尝不可。但是笔者以为更应该注意到“标准”之间的非对称性。实际上，以创建“国教”为诉求的“标准”与旨在判断行为正邪善恶的伦理“标准”在论争各方的讨论中是互相交错的。前者意在通过唤起人的“尊信”感情（无论是借助宗教上的“本尊”亦或是“国体”“皇祖皇宗”的权威）来达到制定国民道德规范的目标。这一路径以强调维系家国观念（后成为所谓“国民道德论”的基础）的，君臣一父子等人际间的感情纽带为核心。而后者的“标准”由于始终没有跨越出理性判断的范畴，并强调情感受制于理性，因而对于前者而言只是一堆空洞的说理，无法构成国民道德的“标准”。从这一点上来说，始终拒绝导入“尊信”要素的《伦理书》注定不能成为万众

<sup>14</sup> 福沢諭吉「読倫理教科書」（慶應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12卷、岩波書店、1970年）。

<sup>15</sup> 文部省編『倫理書』（1888年10月）「凡例」。

<sup>16</sup> 1892年7月11日文部省令第8号「尋常師範学校ノ学科及其ノ程度」。文部省総務局調査課編『師範教育關係法令の沿革』続編（調査資料第10集）。

<sup>17</sup> 对于当时各界的反应，能势荣这样回忆道。“当时根本不知道伦理为何物的人居多，曾有地方政府官厅专门向文部省询问其为何意。我本人在地方任教的时候也常被问道同样的问题”。能势「道德ト倫理トノ間ニ何程ノ差異アルヤ」（『教育評論』第1号、1888年9月）。

信仰的“国民道德”。不过另一方面，如果不靠“尊信”的感情，凭什么能唤起道德的实践（知行合一的确保）呢？对这一问题，《伦理书》编纂没有给出正面回应，其强烈的外来理论色彩更反映出森文政的德育构想与地方指导层及民众现实状况之间的脱节。

围绕寻求国民的道德教育的基础这一共同的时代课题，以德育的“标准”“主义”这样看似相通的语词展开的各方讨论，实则瞬间交汇后便在不同的层面上呈现出平行状态。《伦理书》的编纂过程中的人事变动和遭到的批评恰恰象征了这一点。这一时期，任何教义和学说都可以被当做“标准”拿来讨论，但同时包含文部省在内的任何一方都无法确立一个令人信服的权威性的“标准”。“标准”这一语词所包含的多义性正是道德教育本身所包含的多义性的体现。在森有礼文政期乃至整个教育敕语发布前夜所出现的围绕“道德的标准”的大讨论，其实是一个既开放又充满混沌的，具有同床异梦构造的论争空间。